

主编 阎纯德 吴志良



Sinological History Series

列国汉学史书系

法国汉学史论

(下册)

耿昇 著

學苑出版社

主编 阎纯德 吴志良



Sinological History Series
列国汉学史书系



法国汉学史论

(下册)

耿昇 著

學苑出版社

试论遣使会传教士的在华活动

一、遣使会士入华的背景、过程 及其在华的大致活动

遣使会(Congrégation de La Mission)是入华的天主教五大修会和传教会(耶稣会、方济各会、多明我会、外方传教会和遣使会)之一。该会于1625年在巴黎成立,其宗旨是向乡间贫苦民众们派遣布道使者、在贫穷和偏僻地区创建修院以培养土著民中的青年神职人员、积极从事慈善事业,故而被称为“遣使会”;由于该修会的第一座会所创建于巴黎的圣—辣匝禄(Saint—Lazare),所以也被称为“辣匝禄会”(辣匝禄会士,Lazariste);由于该修会的创始人是法国人味增爵(Saint Vicent de Paul,1581—1660年),故而也被称为“味增爵会”(Ordre de Saint—Vincent de Paul)。该修会于1632年由教皇乌尔班八世(Urban VⅢ,1623—1644年任教皇)批准,正式跃居天主教的重要修会之列。它主要在巴黎设有法国遣使会会所,于1642年才在罗马设立永久会所。该会在17世纪和18世纪初叶并不太活跃,其活动区域有限,其布道对象也仅限于乡下贫苦民众和病人等。

西方基督宗教自16世纪第三次传入中国以来^①,占统治地位的应为天主教的耶稣会传教士。由利玛窦人首倡的“中国文化适应”政策,虽然侥幸取得一时的成功,却埋下了“历史的祸根”,最终导致爆发了影响中西文化交流近两个世纪的“中国礼仪之争”。由于天主教内部不同教派之间的门户之争,以及欧洲列强国家间利益的冲突,他们对入华耶稣会士们发

^① 基督宗教第一次传入中国的高潮要上溯到唐代(景教),第二次是在元代(方济各会),第三次是在明末(以耶稣会为主)。

动了向教廷“告黑状”的大战。其中最积极者便是入华的多明我会,方济各会和遣使会的会士们,其目的就在于取代耶稣会士们在华的地位与利益。教皇严禁基督徒们实施中国儒家礼仪,反遭康熙于1706年将传教士们驱逐到中国大陆之外的报复。教皇于1715年颁布“自即日起”通谕,正式禁绝中国礼仪,于1773年又下令解散耶稣会。法国路易十六(Louis XVI, 1754—1793年)国王于1783年要求教廷传信部准许,由法国遣使会士们取代耶稣会士去主持法国北京传教区。遣使会士们便从教廷下令解散耶稣会自1773年起大举进入中国,奉命接管耶稣会在华传教区及其财产(教堂、设施、墓地),特别是接收了天主教在华的最大中西文文献中心北堂图书馆。遣使会士们于此之前也有进入中国者,但至此才在中国大幅度地发展起来了。

据入华遣使会士辅理主教方立中(J·van Den Brandt, 1903—1908年在华)的《入华遣使会士列传》(1936年北平版)^①统计,在1697—1935年间,在华遣使会会士共有946人(其中有些是由他们培养的华人司铎)。他们之中绝大部分来自法国,也有少数来自荷兰、波兰、意大利、葡萄牙和德国的人。他们的主要活动区是北京、直隶、浙江、江西、上海、福建、内蒙古、湖广、广东、江苏、贵州、河南、山东、陕西、四川、澳门和香港等地。虽然他们在中国的活动区域非常广泛,但在京、津、冀、沪和宁波地区的势力最强,活动最频繁,成绩最显著。

入华遣使会士们在华的墓园很多。在北京主要有栅栏墓园(共安葬64人)、正福寺墓园安葬着近30人、在河北正定府的柏棠墓地安葬着近50人。此外还有宁波的大方井与江北墓地,四川的凤凰山和武昌红山墓地等。

在北京,三个欧洲国家(葡、意、法)都各自拥有人华天主教传教士们的墓园。葡萄牙传教士们的墓园,就是著名的栅栏墓地。它是明朝政府于万历三十八年(1610年11月1日)赐给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Matteo Ricci, 1552—1610年)神父的。在汤若望(Adam Schall, 1591—1666年)神父逝世后,它被扩展成一片占地72亩的墓园,后来被统称为“葡萄牙墓园”。葡萄牙入华的遣使会士们也被安葬在那里。该墓园于1900年被义

^① J·van Den Brandt, *Les Lazaristes en Chine, 1697—1935, Notes Biographiques*, Pei-P'ing, Imprimerie des lazaristes, 1936.

和团拆毁,修复后便被用于安葬入华的欧洲天主教传教士、修院学员和修士们了。

“意大利墓园”与“葡萄牙墓园”只有一街之隔。它是陪同铎罗主教访华的意大利医生索格蒂(Sogotti)逝世后,由清政府赏赐的。其初期的占地面积不会超过一亩地。那里安葬着来自教廷传信部的天主教传教士们,意大利入华遣使会士德里格等人也被安葬在那里。从1900年起,它又成了专门安葬天主教女信徒们的墓园。

法国早期入华耶稣会士们没有单独的墓园,只好“寄葬”于“葡萄牙墓园”。最后,他们于距京师两法里(lieue,每法里约合四公里)远的正福寺附近获得了一片辽阔的地盘,被称为“法国墓园”。该墓园埋葬的第一位法国传教士是入华耶稣会士张诚(Jean-François Gerbillon, 1654—1707年)。其余是于1735年被从“葡萄牙墓园”迁葬过去的。直到1900年为止,法国入华遣使会士们都被安葬在正福寺。它于1900年也遭义和团捣毁,被修复后,由于该墓地距城区太远,最终被放弃了。法国的入华天主教传教士此后便都安葬于栅栏墓地。

自从耶稣会被解散之后,法国在华传教区的前途便成了一种疑问。当时在清朝宫廷中,还有少数具有某种专长技艺和知识的原耶稣会士在活动,并对基督徒们行使圣职。法国路易十六国王曾任命尚留华的原耶稣会士晁俊秀(François Bourgeois, 1723—1792年)神父出任法国在华传教区的长上,但他却无法归化新信徒。非常关注该问题的法国政府,便就此而着手与教廷谈判。在北京的入华原耶稣会士残留人员,也不停地催促法国政府,请求迅速派遣能继承他们事业和财产的传教士赴北京。由于当时的国际形势,法国政府也不会轻易地放弃他们在中国,乃至在整个远东建立起的这个桥头堡,不会放弃他们的贸易、外交、政治和宗教利益。法国政府先后制订的多项计划均遭搁浅。前耶稣会中国传教区的司库嘉类斯(Du Gad, 1707—1786年)曾提议建造一座修院,来继承原耶稣会士们事业的计划,遭到了摒弃。让晁俊秀神父在北京建立一个宗座代牧区或宗座监牧区的计划,也最终化为泡影。当时唯一切实可行的办法,便是将北京传教移交给天主教的另一个修会或传教会来继承,由此而使之继续存在下去,以最大限度地维护法国在中国的利益。

法国海军部于1782年呈奏国王的《有关神职人员的报告》指出,此时在法国存在着两个学术水平较高的天主教修会的会士,即本笃会会士

(Bénédictins)和奥拉托利会会士(Oratoriens),但该项报告将他们统统排除在外了。本笃会会士们的生活方式及其工作具有高度专门性,注重于招募低级修士和贫苦民众,主张终生从事劳役,因而使他们很难适应于传教区的圣职,也不可能赢得具有相当高的文化水平的中国人的欢心。奥拉托利会会士过分受曾与耶稣会士激烈冲突的冉森派信徒们的操纵,不但不利于不同修会的传教士们在中国和谐地工作与生活,反而会毁掉耶稣会士们历尽千辛万苦才在华为天主教积累的正面影响。

嘉类斯于1872年又致信法国国务大臣贝尔坦(Henri Bertin),请求他向海军部长为北京传教区推荐巴黎外方传教会。这项建议于1776年由法国国王提出并经教廷批准。但巴黎外方传教会的负责人认为这项任命无法接受,其原因之一是“外方传教会不是学术团体”,而且该修会经常拒绝接受任何其长上不是选自本修会的司铎们的布道使命,况且北京的主教中从来也未曾有过外方传教会的会士^①。实际上,外方传教会深知自己难以取得入华耶稣会士们的那种辉煌成就,不愿意使自己的在华活动拥有“官方”身份。

因此,海军部在致法国国王的报告中指出,在法兰西王国的所有知名修会中,唯有遣使会才堪任接管耶稣会北京传教区,成为法国“官方代表”的入华修会。虽然遣使会不是一个学术团体,但这个人数众多的修会中不乏有能胜任其职务的人。法国国王于是便要求教廷颁布教谕,决定由法国遣使会士取代已被撤销的耶稣会的会士们。此后不久,法国海军部办公厅主任德韦夫尔(de Vaivre)便受法国国王差遣,去拜访遣使会的总会长雅吉埃(Jacquier)。总会长开始推诿,声称他无法为一项如此重要的事业提供所必需的人员。其托词的真正原因却是,遣使会总会长自己并不想派人到耶稣会士们曾取得过巨大成功的地方行使圣命,他自信自己难以达到昔日耶稣会士们的那种辉煌。总会长甚至一连两次婉拒了国王的要求。国王最后答应总会长,将撤并该修会在法国国内的某些机构,以使他拥有充足的德才兼备的司铎被派往中国,总会长才勉为其难地接受了钦命。

法国海军大臣责令德韦夫尔主任处理这件棘手之事,而且该大臣有时也亲自出面决策。他于1782年11月7日致雅吉埃总会长的信中,要求总

^① 安多(A·Thomas):《北京传教史》(Histoire de La Mission de Pékin),1925年巴黎版(非卖品),第2卷,第10页。

会长适时度势地运用一切手段,以保存和发展从宗教与政治角度来看,对于法国都十分重要的北京传教区。遣使会总会长“被迫”接受国王的敕令之后,立即着手运筹遣使会士入华诸项事宜。

遣使会总会长一旦受命,德韦夫尔便立即与教廷传信部联系,以谋求教廷批准法国国王的钦定。教廷传信部最终于1783年12月7日发布教谕,同意路易十六国王以遣使会取代已被取缔的耶稣会中国传教区。1874年1月25日,法国国王便颁布诏书,正式命令遣使会会士们进入中国,以接管已被撤销的耶稣会士们在华的任务和财产^①。由此可见,法国中国遣使会传教区具有“官方代表”的身份。这一点与以“法国国王数学家”耶稣会士为代表的耶稣会中国传教区,具有某种相似性。

二、法国与葡萄牙两国政府 在入华遣使会问题上的竞争

最早入华的遣使会士中的“三大台柱子”是意大利人毕天祥(L·A·Appiani, 1663—1732年)、德国人穆天尺(J·Mullener, 1673—1742年)和意大利人德里格(P·-P·T·Pedrini, 1671—1746年)。毕天祥曾先后希望在澳门、广州和北京创立遣使会的修院与慈善机构,也曾希望赴四川去实现其夙愿,但成效均不显著。他曾积极配合和协助教皇大使铎罗(de Tournon, 1668—1701年)出使中国的活动,筹划解决“中国礼仪之争”的陈年积案。穆天尺是教廷命令的坚定执行者和耶稣会士策略的坚定反对者,也是最早培养出三名华人司铎的传教士。音乐家德里格与画家马国贤(M·Ripa, 1682—1745年)、以及数学家、地图家山遥瞻(G·Fabre-Bonjour, 1710年入华)关系密切,他实际上是通过这一批人而与清朝宫廷建立了联系。

本来,在争夺北京传教区的欧洲国家中,除了葡萄牙和法国之外,意大利也颇具实力。但意大利传教区在这场角逐中,最终还是退出了舞台,其主要原因是他们没有最早建立培育华人司铎的修院。

清朝朝廷对于北京传教士们的敌对情绪越来越严重了,此后于清宫中仅有钦天监的三名欧洲成员——三名遣使会士:葡萄牙人李拱辰、福文高

^① 安多:《北京传教史》,第12—13页。

和高守谦,还有一名法国翻译南弥德。其他任何希望居住在中国的人,都必须放弃布道。1812年8月8日,中国的总督和官吏们将所有在北京的传教士都召至葡萄牙神父们的一座住院中,然后向他们宣布说,皇帝不想驱逐他们中的任何人,只是禁止他们传教布道;如果他们之中有人欲离华返欧,那他们完全有权自由选择。此时,有四名意大利传教士和葡萄牙的毕学源主教,都表达了回国的愿望。经过一个月的深思熟虑之后,毕学源主教最终愿意留下。由于四名意大利传教士未任公职,故没有必要留在中国了。因为意大利的传教士们既未在土著民中培养司铎,也未曾培养修院的学生,所以他们只好变卖自己的财产,携款而去。当时没有任何人敢收购他们的住院,清朝皇帝只好为此而付资。四名意大利传教士由清朝政府出资被解往广州,令他们乘坐能够遇到的第一艘开赴欧洲的船舶。事实上,这四名意大利传教士中有一名到了马尼拉,另一位留在了澳门圣若瑟修院,还有两名前往槟榔屿修院。

从此之后,欧洲传教士在中国的争夺,就主要是在葡萄牙人和法国人之间展开了。当时在北京只有七名传教士,四名属于葡萄牙传教区,三名属于法国传教区。1882年当时被认为是北京四大教堂中最漂亮和最富裕者东堂(圣若瑟堂)的藏经楼失火,清朝宫廷又明令禁止重建。这样一来,葡萄牙传教区在这场竞争中,便逐渐处于劣势了^①。

早期入华遣使会士们,依惯例主要是经由澳门入华,或者是从内地派遣修士到澳门学院学习和晋铎。在1851年之前,于在华的152名遣使会士司铎中,便有83人是经澳门进入中国内地,或者是由中国内地遣使会士们派遣到澳门的。可见当时葡萄牙政府的保教权势力还相当强大,各国的屈从程度还相对较普遍^②。

在1784—1832年间,葡萄牙籍入华遣使会士计有21人,分布在中国澳门、北京、南京和江南等地。他们分别于1784、1791、1800、1802、1803、1804、1813、1825和1832年等数批莅华。其中不乏有些重要人士,如南京主教达希尔瓦(E·G·da Sylva,1763—1790年),1789年被葡萄牙政府任命为南京主教,但在未到任之前便逝世于果阿。南京主教毕学源(C·

① 遣使会士于纯璧(Alphonse Hubrecht·C·M·):《北京传教区与遣使会士》(La Mission de Péking et Les Lazaristes),第174—176页。

② 方立中:《入华遣使会士列传》。

Pereira, 1763—1838 年) 于 1804 年被任命为南京主教, 1827 年被任命为北京教区的管理人, 从 1838 年起又居住南堂, 曾出任清朝最后一位钦天监正。包主教(Pereira de Borja, 1777—1845 年) 于 1841 年被葡萄牙王廷任命为澳门主教。苏萨(Jochim de Souza, 1774—1818 年) 于 1804 年被任命为北京主教的辅理主教, 但因爆发教案而阻止了他进京赴任。此外还有李拱辰(Joseph Ribeiro, 1767—1826 年), 1791 年入华, 1803 年任东堂长上, 于 1818 年以宗座代牧的身份主持北京教区的教务。高守谦(V · Monteiro da Serra, 1852 年逝世于北京) 于 1803 年到达澳门, 于 1804 年到达北京, 长期居住北堂, 以保护原法国传教区的财产。他曾被葡萄牙国王任命为北京的主教, 而教廷却拒绝批准。赵神父(J · de França Castro E Moura, 1804—1868 年) 于 1825 年进入中国澳门, 次年又被任命为南京署理主教。后于 1833 年被任命为北京署理主教。他于 1841 年被葡萄牙宫廷任命为北京主教, 但教廷希望撤销该主教位, 以彻底结束葡萄牙的保教权。赵神父拒绝了这项任命, 教廷也剥夺了他对北京教务的管辖权。他于 1847 年离开北京教区, 从澳门撤退出去了。从此, 北京传教区, 便被留给法国遣使会士孟振生(Joseph-Martial Mouly, 1807—1868 年) 主教管辖了^①。

正当法国国王寻求让遣使会士来取代已被解散的耶稣会会士, 以图振兴法国在华传教区时, 葡萄牙女王也于 1781 年呼吁葡萄牙遣使会士们去主持果阿修院。葡萄牙于 1782 年任命的北京主教方济各会士汤士选(de Gouvea) 在前往广州(他于 1785 年入华) 的途中, 于 1784 年路经果阿, 曾非常妥善地管理过该修院。他要求葡萄牙女王在澳门也开办一座类似的学院, 并从果阿的遣使会士中选择能胜任者来主持该学院, 以便培养土著民中的神职人员。1784 年, 葡萄牙遣使会士科雷亚·瓦伦特(Correa Valente, 1735—1804) 和意大利遣使会士维拉(J · -A · Villa, 1752—1803 年) 到达澳门, 汤士选立即将他们安置在过去由耶稣会士们执掌的圣一若瑟学院中。该学院在近半个世纪期间, 为广东、广西和北京传教区培养了许多华人司铎。葡萄牙遣使会士们便以圣若瑟修院—学院为基地, 最终谋求主宰中国传教区。葡萄牙遣使会士们于 1801 年到达北京, 并且占据了北京的圣若瑟堂(东堂), 后于 1812 年又强行进入南堂(圣母无原罪堂),

^① 遣使会士于纯璧(Alphonse Hubrecht · C · M ·): 《北京传教区与遣使会士》(La Mission de Péking et Les Lazaristes), 北京遣使会印书局 1939 年版, 第 282—285 页。

从而获得了在中国京师的立足之地。这也成了他们争取在华传教区的资本,并且还千方百计地为法国遣使会士们进入中国设置障碍。法国入华传教士们也由此而逐渐地设法绕开澳门,而分别从广州、上海和宁波直接入华。这样便最终形成了欧洲两大强国遣使会士在华的对峙与争夺局面。

当法国遣使会士李士奈(J·-F·Richenet, 1759—1836年)和马司铎(L·-M·Dumazel, 1785—1818年)在澳门等待接受进入中国内地的皇家之“票”时,广州商人和葡萄牙的经纪人最终达成共识,联手为他们设置障碍。当时要赴北京的任何外国传教士,都必须由设在广州的欧洲夷馆负责人(领事或大班),向中国大商行推荐。广州约有10余家这样的中国商行,享有某种与欧洲人打交道的垄断权。由他们向官府上表,要层层上报到总督府,最后呈达朝廷。这些手续需要漫长的时间。除了广州商人的种种刁难之外,受葡萄牙人控制的澳门政府,不但会拒绝向那些不承认葡萄牙保教权国家的传教士们作鼎力推荐,相反还往往会采取遏制态度。

在葡萄牙政府和教廷驻里斯本大使的干预下,终致葡萄牙女王于1799年1月16日颁布的诏令,禁止澳门总督保护法国传教士,澳门“议事会”也拒不向广州总督推荐法国传教士。所以,当葡萄牙遣使会士福文高(D·-J·Ferreira, 1758—1824年)和李拱辰于1801年、毕学源和高守谦于1804年顺利进入北京并占据圣若瑟堂时,李士奈和马司铎仍在澳门空耗时日地等待。他们最终遭到了拒绝,在无奈之下他们只好绕道而行。

其实,在法国与葡萄牙两国的人华遣使会士之间,既有竞争也有合作。1803年。在澳门圣若瑟堂的葡萄牙遣使会士科雷亚(Manoel Correa Valente, 1735—1804年)长上,为了中国事务而返回葡萄牙时,曾受法国遣使会士们的委托,前去向葡萄牙政府说情。他希望政府能将赐予葡萄牙遣使会士们的恩泽,也扩大到法国遣使会士们身上,至少是不要刁难他们,不要对他们进入中国的门户设置障碍。科雷亚运用了其全部威望进行游说,设法任命他的两名葡萄牙遣使会士教友分别出任北京和南京的主教。自希尔瓦主教逝世后,南京主教位一直空缺,由北京主教——葡萄牙方济各会士汤士选代管。葡萄牙国王考虑到汤士选主教年事已高,于是便撤销了他对南京传教区的管辖权,并将该教区委托给了葡萄牙遣使会士毕学源。科雷亚同时还向教廷建议,任命葡萄牙遣使会士苏萨(Joachim de Souza Saraiva, 1774—1818年)出任北京主教的辅理主教。教廷批准了这两项任命,由于可见葡萄牙为维护自己在远东的权利,仍在作竭力挣扎,同时也不

想与法国遣使会士们彻底决裂。

科雷亚所获成果不大,但他在返回中国的途中,却死于海上的一场海难事故中。苏萨由汤土祝圣后,一直在澳门等待寻求进入北京的机会,因为中国朝廷当时严禁任何欧洲人进入中国,无论他们是否为皇帝服务都一样。由于清朝政府同时又拒绝任何欧洲传教士离开北京,故毕学源也无法赴南京就任主教。葡萄牙政府的如意算盘并未完全实现。这其中也有法国传教士们从中作梗的原因。

法国遣使会传教区长上一旦接受了接管法国北京传教区的任务之后,便将自己准备派往中国的传教士名单报告了海军部大臣。其中最著名者有下述三人,是重点推荐人士。他们经法国国王批准后,在某种程度上成了“钦点”的入华遣使会士。

罗广祥(Nicolas-Joseph Raux, 1754—1801年)当时已经是遣使会总会的神学教授了,年长33岁。他于1783年12月17日被教廷传信部任命为法国在华传教区的长上,1784年到达广州,1785年4月29日到达北京,1785年5月正式就任法国在华传教区长上,并当选为清朝钦天监的成员,逝世后安葬于正福寺。罗广祥到达广州后,在1784年11月2日致其家庭的书简中写道:“……我穿着一套新衣服,三层丝袍套着穿,非常肥大;头戴一顶带有红丝缨的圆帽,头颅之后垂着一根长长的尾巴;脚蹬靴子、手执一把扇子。当你们看到这一切时,一定会忍俊不禁,而第一个发笑的正是我本人。”^①当他到达北京时,受到了大清宫廷中的四名原法国耶稣会士们的接待,而且尚能与他们友好相处。他们认为清朝皇帝对于皇城中的欧洲传教士人数的增加一定感到高兴,而对于分散在大清帝国各省中的传教士们却怀有戒心,甚至还实施打压^②。

罗广祥到达北京后,要办的第一件事便是制订一项《临时协定》(Modus Vivendi),以调解遣使会与原耶稣会及其他修会传教士们之间的关系,包括分配耶稣会遗产等敏感问题,特别是每年为文学工作的拨款、北京住院与地产的收入问题。此外,由于意大利传教区也正在通过教廷而企图夺取法国北京耶稣会的遗产,从而使形势骤然间更加复杂化了。但经过罗广祥的斡旋,再由法国国王与中国皇帝调解,法国遣使会士最终成为耶稣会

① 《遣使会回忆录》(Mémoires)第2卷,第75页。

② 同上引书,第2卷,第76页。

北京传教区遗产的唯一合法继承者,同时也为尚残存于宫廷中的耶稣会士们留下了必需的生活手段。

罗广祥以其才能和信心,除了成功地调解各方面的关系之外,还与法国政府海军部维持着一种事务性的通信关系。在1785—1787年间,他每年都向海军部寄去年度报告,其中有些可能被清朝政府的新闻审查机构截留在广州了。这些报告形成了研究遣使会士们在北京的最初工作和探讨中国国情(旱涝灾害、饥荒、北固使节、俄罗斯商队等)的宝贵资料。

罗广祥出任法国传教区新长上之后,对每个原耶稣会士都发放400两白银的年金。这就赢得了各修会传教士们对他的好感。他还要在住院中为每名耶稣会士单独留一片空间,以供他们自由地居住和生活。耶稣会士们逝世后,必须将他们的一切都留给遣使会传教士。罗广祥对待世俗问题的这种指导思想,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始终由遣使会士们所遵循。

尽管罗广祥入华时年龄已不小(30岁),但他很快就克服了学习汉语的困难。他于1785年10月30日在致其姐姐的书简中指出:“中国的语言非常奇特,与欧洲诸语言没有任何关系。但我却轻而易举地学会了它。这使所有人,首先是使我自己感到吃惊。我现在可以用汉语作祈祷了,并且为圣体瞻礼而写了一部教理问答书。”

他与清朝钦天监的官吏们保持着友好关系,并继承葡萄牙耶稣会士高慎思(José d'Espinha, 1722—1788年)而出任钦天监监正。但他在受命担任这项正式职务之前,还曾代替已经年迈的法入华耶稣会士钱德明(Jean-Joseph-Marie Amiot, 1718—1793年),为清廷担任与外国列强人士,特别是与俄罗斯人交涉时的翻译。

罗广祥还学会了清王朝的官方语言满语,甚至还编写了一部满语语法书,后来又于1787年寄给了法国海军部大臣和法国驻广州的代表——汉学家德经(de Guignes, 1759—1845年)。他还编写了一部共分两册的鞑靼语—满族语词典,第一册在法国大革命期间被英国人掠去并收藏在英伦皇家图书馆,第2册辗转到巴黎后又交给了汉学家雷慕沙(Abel Rémusat, 1788—1832年)。

罗广祥为了摆脱受葡萄牙保教权的束缚,曾设想在广州设立一位司库,负责法国传教区与中国当局的交涉,从而可以规避澳门葡萄牙当局的干预。他本来希望任命原法国入华耶稣会士梁栋材(J.-B. Joseph Grammont, 1736—1812年)出任此职,并设法游说中国皇帝接受。但中国商会

却想方设法地让人把该神父召回了北京。罗广祥又利用遣使会士韩纳庆(Robert Hanna, 1762—1797年)在澳门停留的机会,委托他负责司库部。罗广祥逝世之前不久,又有一名意大利遣使会士维拉(Jean-Auguste Villa, 1752—1803年)任法国传教区的正式代表,负责直接推荐准备派往北京传教区的法国传教士。中国皇帝的“票”终于被颁发给了广州总督,但此人因当时正指挥平叛部队作战而不在城内。其衙门的人却反而将该“票”又转交给澳门“议事会”了。维拉又从澳门赶到广州,以推荐李士奈和马司铎这两位传教士入华,但葡萄牙人却始终都明确地反对这类举措。最后还是正在广州居住的遣使会士明坚(P. -V. -Marie Minguet, 1764—1841年)向广州总督推荐了那两名法国遣使会士。这两位法国遣使会士被派往湖广省。由于无法在澳门得到进入中国内地的许可,他们只好绕道跋涉交趾支那、东京湾和四川才到任^①。

罗广祥由于受一次中风的袭击,于1801年11月16日逝世于北京的北堂。从当时的形势来看,这是法国传教区无可挽回的损失。吉德明曾经说过,“所有人都对此感到遗憾,甚至也包括异教徒在内”。罗广祥几乎具有了一位传教士和一名传教区长上应具备的全部品德与学识。南弥德认为,罗广祥似乎能够适应一切:孤独、社交、布道、经商等,对一切都得心应手,而且还熟悉所有科学的基本原理。他本人不是文学家,却肯定对文学感兴趣并以拉丁文和法文写作。他可以熟练地讲汉语,证明他曾有过许多用汉语交流的实践。尽管他很少学习鞑靼语,却能熟练地用这种语言来表述。法国驻广州的代理人庇隆(Piron)也曾认为,罗广祥拥有天才,而且性格温和,赢得了多方位的信任^②。

法国“钦点”的第二位入华遣使会士是吉德明(Jean-Joseph Ghislain, 1751—1812年)。他于1785年4月29日到达北京,负责培养遣使会北京修院的学生。罗广祥逝世后,他出任法国中国传教区的长上。他于1812年逝世后,被安葬在正福寺。吉德明基本上是罗广祥的同乡,于1771年进入遣使会修院。他学习了数学之后,又学习了物理学和化学,还精通火泵、机械、电力和电机技术,善于制造汽球。但他到达中国之后,却专心于教务和培养华人土著民中的基督徒了。他在北京为中国青年创办的修院中,便

① 安多:《北京传教史》下卷,第58—60页。

② 安多:《北京传教史》下卷,第76页。

有 15 名中国学生^①。

吉德明本来就是一位与罗广祥的职业相去甚远的人物。他全心身地投身于宗教事业,而将与外部联系的烦琐事务,都转嫁给了罗广祥。他与中国官吏们打交道时,也只是获得过一种好奇性的成功,因为他只接受过低水平的初等教育。当英使马戛尔尼(George Macartney, 1737—1806 年)出使中国以缔结中英之间的一项条约时,吉德明的机械知识大大地帮助他们。吉德明在巴茂正修士的帮助下,装配了英使进献给中国皇帝的自动机器,因为他的背后还有一个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本来英使来华时,最大的障碍之一就是找不到翻译。他们在英国时还曾向巴黎的遣使会士与外方传教会的传教士们求援,均无济于事。他们从那不勒斯中国学院找到的两名毫无经验的青年汉语翻译,却无法挽救这次出使的失败。因为马戛尔尼出使中国的失败,除了“国家利益”之外,中英双方在礼仪方面的互相误解,也是铸成他们失败的重要原因。尽管英使指责入华的法国传教士们,而这批传教士实际上却帮了他们许多忙。这也反映了西方列强在华利益,既有一致的因素,也有互相冲突的潜在致因。

法国遣使会士南弥德曾取代原耶稣会士贺清泰(Louis Antoine Poirot, 1735—1813 年),于清宫中为西洋人充当鞑靼语翻译。特别是当清廷向圣彼得堡遣使时或与俄罗斯人打交道时,更为如此。

罗广祥逝世后,吉德明同时兼任其新职务及神学教育这两项工作,于是便请求由葡萄牙控制的东堂的司铎们帮助他讲授中文哲学课。葡萄牙传教士菲勒蒂(Ferreti)接受了这项任务,并且还完成得很好。这也说明法国与葡萄牙两国遣使会士之间虽有竞争,但也能合作。

吉德明本来希望继罗广祥逝世后出任清朝钦天监监正,从而促使澳门当局对法国遣使会士们更友好一些。但却由葡萄牙籍的方济各会士汤士选主教继任了这项职务,从而使他原来担任的监副的职位空缺了,汤士选于是便指定由南弥德来选择。为了不激起葡萄牙传教士们的敌意,南弥德仍然选择了葡萄牙遣使会士福文高,尽管此人只能很蹩脚地讲几句汉语。这些善意行为终究导致东堂的传教士们致信澳门和里斯本,谋求解除其同胞们对于法国传教士们的戒备心态。

罗广祥逝世后,由年长 43 岁的吉德明继任其职务。吉德明在清宫中

^① 方立中:《入华遣使会士列传》,第 6 页;于纯璧:《北京传教区与遣使会士》,第 75 页。

既表现得才华横溢,也显得很虔诚十足。从其气质来看,他更喜欢内向性事务,而不是对外交往。他与清朝皇帝和权贵们的关系,被严格地限制在名义范围内。他很愿意骑驴或步行前往正福寺墓地。他感到最大的烦恼还是老问题。首先是葡萄牙传教士对法国传教区的封锁,因为葡方极力阻止法国传教士们进入北京;其次是北堂的处境艰难,因为其人员变得势单力薄了。在1801年时,北堂的司铎减少到只有五名了,即吉德明、南弥德和三名华人司铎。南弥德的旅伴韩纳庆(Robert Hanna, 1762—1797年),因劳累过度而患胸腔疾病,并先于罗广祥三年逝世,本来罗广祥曾打算让此人接替他于清宫中的工作。当时的北京主教——方济各会士汤士选很快就承认了吉德明的北堂长上的身份。

吉德明很希望法国给他派遣两名具有专业知识的传教士——一名画家和一名钟表匠。因为当时在清宫中的优秀画家耶稣会士潘廷璋(Giuseppe Panzi, 1734—1812年)已经年逾花甲,尽管他经常在宫中,却也不能过分劳累了。因此,过去人才济济的法国北京传教区,现在甚至无法为清朝皇宫提供一个学艺双馨的会士了。

在敌视洋教的嘉庆皇帝执政期间,爆发了1805年的教案。这次教案的缘起,是由于受澳门葡萄牙遣使会士们派遣的一位信使,要将任命毕学源为南京主教的教皇谕旨送达北京。他在返回途中于江西省被清朝官吏抓获。恰巧这名信使还携带着不同传教士们要寄往欧洲的书简。其中包括意大利奥斯定会士、由教廷传信部派遣的传教士和清朝钦天监成员阿德奥达特(Adéodate)神父有关北京和山东传教区划界问题的一封信,信中附有一幅汉文地图。这引起了当地中国官吏们的警觉,于是便上报皇帝。皇帝由此而认为,其同谋者正是传教士和基督徒们。由此而爆发了一场大教案,大批在京传教士遭逐^①。

在这场教案的高潮中,汤士选于1808年死于南堂。东堂或圣若瑟堂于1812年被拆毁,东堂的葡萄牙遣使会士们,如毕学源、李拱辰和苏萨等都被迫迁至南堂逃难。于此同时,法国遣使会士吉德明和南弥德也只好遣散其修院的部分学生。在本来就积重难返的困难中,又雪上加霜地出现了财政困难,由于当时必须修缮因暴雨而几乎完全坍塌的建筑物。1811年,御史甘家斌又一次挑起教案。传教士们为了逃避清朝官吏们的搜捕,几乎

^① 《仁宗实录》卷142,《清代外交史料》卷1,《北京传教史》卷下,第82—97页。

耗尽了其全部积蓄^①。1912年,吉德明已心力交瘁,预感到了自己会不久于人世了。他将其职务交给了南弥德,令人把自己抬到了法国传教士们的正福寺墓地,以等待就地死亡,并坚持他一生恪守的贫穷和简朴之信条。事实上,过去有的传教士们的葬礼很豪华和很昂贵。罗广祥为汪达洪举行的葬礼共耗费4000法郎。汤士选曾对传教士们的殡葬礼仪作过大幅度简化。

吉德明于1812年8月12日逝世于正福寺墓地,由南弥德及其初修士们陪同他度过了弥留时光。他享年62岁,其中28年是在中国度过的。他不但使北京的法国传教机构变成了一个学术与艺术馆,而且还使清朝京师及各省中的基督宗教得以发展,特别是亲自巡视这些传教区。他为北京传教区作出了相当大的贡献。吉德明逝世后,法国北京传教区就只剩下一名遣使会士南弥德和一位80多岁的原耶稣会士贺清泰了。这也标志着该传教区已开始走向衰败,甚至是趋于穷途末日了。

法国“钦点”的第三位入华的遣使会士是巴茂正(Charles Paris, 1738—1804年)修士。他于1785年到达北京,充任清朝皇宫中的钟表匠。此人本来是一位机械师,又以“若瑟修士”(frère Joseph)之名而著称。他虽然未曾完成过高等学业,却是一个充满智慧和具有全才的人物。他于1804年逝世于北京,其墓地也在正福寺。巴茂正在清朝皇宫中,取代了已故的入华耶稣会士汪达洪(J·M·Tournu Ventavon, 1733—1787年),成为专职钟表匠和机械师。他曾制造过一座挂钟,在长达3个月期间不用上钟摆的发条。清朝皇帝似乎对此感到兴致勃勃。时任遣使会总会长的凯拉(M·Cayla)于其1789年1月间的通报中,专门表扬了巴茂正这位“钟表匠修士”。巴氏在清朝宫廷共忠诚地服务17年(1787—1804年)。由于他具有全才,故而除了作为钟表匠而为宫中制造多座钟表之外,还制造了两座报时钟、大小管风琴各一架。他还为清朝皇宫制造了一个有四五尺高的机器人。当然,也有人怀疑这些机械制品是通过澳门而从欧洲进口,他可能仅仅是对进口产品略作巧妙修改而成的,他也可能是利用了能工巧匠荟萃的内务府造办处。巴茂正用汉、满、蒙、藏四种文字写下了对大清皇帝的颂词。他为欧洲的汉学出版物提供了许多漂亮的汉文方块字的字模,这是欧

① 《仁宗实录》卷243和246,《北京传教史》卷下,第95—97页。

洲当时为刊印汉学著作所奇缺的物品^①。

巴茂正修士于1804年9月6日逝世于北京。他于此之前就精疲力竭了,每天蹒跚着前往皇宫中应差。他于该年7月中旬便交出了自己在皇宫中工作室的钥匙,深知自己再也无法入宫应差了,从此便长期卧床不起。法国传教区于此之后在皇帝身旁就没有自己利益的代表人了,只好又由年逾五旬的吉德明四处奔波,既负责宫中的事务,又负责布道事业。

在1784—1832年间,入华的葡萄牙遣使会士为21人,无论是在人数上,还是在权势上,均居西洋各国之首。但由于法国和其他国家的抵制,特别是由于各国传教士之间的无休止争斗,教廷已决定撤销葡萄牙在远东的保教权。为此目的,教廷将在华的原有传教区划分成了诸多宗座代牧区。同样的措施也适用于澳门,教廷仅仅为澳门保留了“主教府”(总铎府)的名称,但也只行用于葡占地。教廷将这项决定通知了葡萄牙籍的入华遣使会士主教马热罗(Jeronimo-José de Matta, 1804—1862年,1825年到达澳门),撤销了该主教对中国广东、广西两省的管辖权,同时又于这两个省设立独立的传教区,委托给巴黎外方传教会管辖。教廷的本意是作调停,却适得其反地强化了葡萄牙人的不妥协态度。马热罗主教最终发展到1850年发表了致其教区信徒们的主教通谕:《为抗议教廷传信部在交由葡萄牙女王陛下管辖下的传教区实施改革的问题而致全体信徒的主教通谕》。这种态度更激起了法国的反感,启发法国遣使会士们作出了撤出澳门,将其司库部迁至中国另一个城市——特别是已开放通商的五口之一的决定。由此开始,在华遣使会的主导权从葡萄牙人手中转向法国人手中的过程,便逐渐完成了。

基本上是在同一时期(1784—1800年),法国入华遣使会士仅有11人,分别于1784、1788、1791、1798和1800年几批莅华。他们主要分布在中国的北京、湖广和澳门地区。1800—1829年之间,没有任何法国遣使会士被派往中国。1829年,陶若翰(Jean-Baptiste Torrette, 1801—1840年)莅华,先后出任澳门遣使会住院的长上、委托给遣使会士们管辖的法国传教区巡按使。由此而开创了遣使会士们入华的一个新高潮。

在1829—1850年间,法国入华遣使会士共有32人。他们分成1829、1832、1834、1835、1837、1839、1840、1841、1842、1844、1846、1848、1849和

^① 《北京传教区与遣使会士》,第75—79页。